

今年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韩树英诞辰100周年，从事党的哲学理论教育工作68周年。韩树英1922年10月15日出生于辽宁大连。1942年留学日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从事革命活动；1943年底，毅然放弃学业，克服艰难险阻回国投身革命；后进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后为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专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先后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部）副主任、主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副校长等职。韩树英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和普及，为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党校教育事业特别是哲学理论教育事业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韩树英对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对象、体系和作用的深刻阐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深入阐发，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及其所反映的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的揭示等。这种阐述、阐发和揭示，以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为中心，立足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不仅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基本原理，充分借鉴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而且还致力于从哲学的高度反映、总结和概括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 basic 经验，以及致力于反映党和理论界对这些基本经验所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贯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间的联系，赋予了理论阐释以鲜明的时代感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丰富、具体化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内容。

明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对象、体系和作用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如何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根本特征，这是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也是编写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首先必须面对和回答的根本性问题。为了对这一问题尽可能作出科学阐释和说明，韩树英反复悉心研读经典作家原著，注意广泛借鉴和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对民主德国哲学界关于“实践”概念和“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及其在国际哲学界产生的影响给予极大的关注和认真的研究。在1981年10月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韩树英就“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一命题的意义作了深入阐述，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这一重要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哲学的根本特点看成



□ 侯 才

“实践的唯物主义”，如果说这样也算给他们的哲学标上了名称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基于这种理解，韩树英始终坚持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书斋哲学，而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他还将“实践的唯物主义”看作一个更高层次的概念，用“实践的唯物主义”来统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将后者视为前者的具体化，他指出，“实践的唯物主义，包括的内容很广泛，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包括在内”。韩树英的这一创见，比此后于1983年开始在我国哲学界普遍兴起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早了两年，可谓开启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先河。随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被正式写入1983年9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并得到了多方面和系统的发挥。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在《真理的实践标准和科学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纲）》《自然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体系、结构》等文中，针对国际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韩树英提出，作为完整的科学的哲学世界观，从研究对象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是以人同周围环境的关系为中心，重点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二是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本质特征及其一般发展规律问题，三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哲学问题。韩树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这种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构。韩树英认为，在编撰通用哲学教科书时，鉴于其性质和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表述宜采取谨慎的态度。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分的框架固然有其局限性，即容易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化，但是如果融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一体，则容易导致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甚至肢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容。鉴此，他在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的过程中，一方面从学科角度对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调整和补充，如增加“物质世界的联系和



发展”“认识的辩证过程”“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自觉活动”“科学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专门章节；另一方面遵循“结合社会主义的发展、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问题来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原则，对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扩展和延伸。这突出体现在：专设章节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探讨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生作用的特点，以及揭示历史唯物主义诸基本原理及其所反映的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和意义，等等。这种对体系建构的处理，形式上虽然基本沿袭了既有的传统体系结构，但实际上已经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创新了这一体系结构。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韩树英根据时代的变化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具体作用进行深入揭示和独创性阐述。他将其具体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对帮助人们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和加强社会成员政治上的统一具有政治的意识形态作用。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对不断深入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具有理

论的认识作用。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具有科学的方法论作用。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主义意识的最高形式，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对人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风貌的形成具有思想指导的教育作用。

深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韩树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基本原理的深入阐释和发挥具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以及相关论文中，涉及诸多领域和方面，内容十分广博。这些阐发不仅深化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基本原理的内容，而且也澄清和回答了一些重大哲学理论问题。例如：为了深化和丰富对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以及意识的理解和阐述，对非欧几何、相对论、人工智能、系统科学等重要自然科学成果进行了哲学阐述和概括，对“黑洞”假说、“宇宙大爆炸”理论、信息的本质等现代自然科学提出的疑难课题给予了哲学分析和解答；从意识的动态过程的角度对意识的功能进行具体揭示和全面概括，提出意识具有“认识的作用”“预见的作用”“确定目的、目标和任务的作用”“制订行动路线、计划和选择较优方案、方法的作用”“对人们的行动的指导与控制的作用”以及“规范和调整社会成员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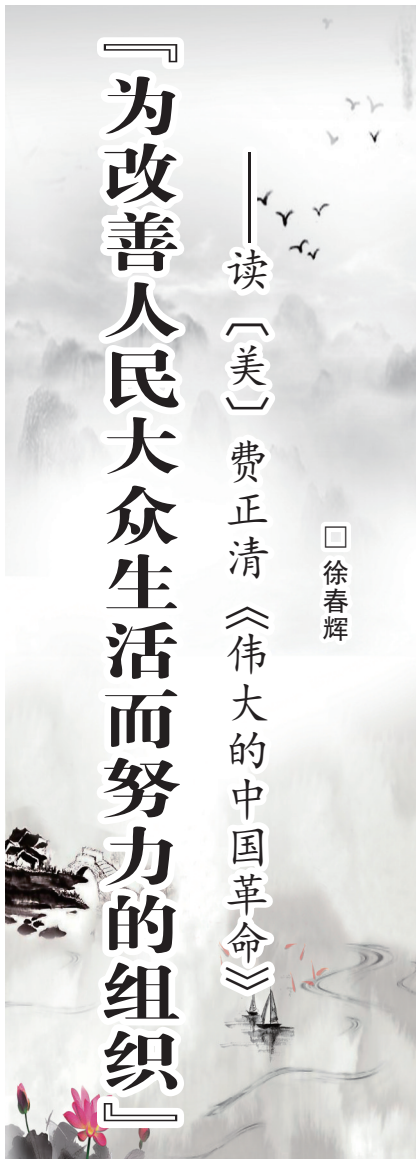
关系的作用”等六种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作用；揭示系统科学中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涵，对其进行抽象和提升，将其主要概念纳入传统的辩证法理论中；针对传统教科书在“历史唯物主义”绪论部分通常仅论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而未能涉及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这一缺陷，设置专门章节对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与人的主体活动的关系进行深入阐述，提出“人类历史过程是社会客观规律的作用与人的主体活动的统一”，社会历史规律不仅是人类社会诸种现象和过程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同时更是人们的实际活动与这种活动的结果之间的联系，它是客观的但绝不是人们在的活动之外自动发生的规律，而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针对学界和社会上片面地强调和夸大认识论的倾向，科学全面地阐明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认识论既是其完整哲学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或分支学科，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殊地位和相对独立性；针对以往对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相互关系论述的误解及其在实践中带来的危害，对毛泽东论述的两种“决定作用”的不同内涵进行仔细辨析和深入阐发，指出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指的是生产力规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趋势，而“变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作用指的是在实践活动中把握影响事物发展的主要环节，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生的，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因此，绝不能把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决定作用”等同起来而陷入“循环决定论”；等等。

具体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表现

韩树英认为，哲学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应是高度统一、密不可分的。他强调，“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是最终落脚到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就是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是半途而废，没有结果；另一方面，讲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理解它，也就把握不住它的根本，会产生各种片面的理解，导致犯各种错误”。这种对哲学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统一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自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该书下大力气对辩证法各基本规律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和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揭示，并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与之相关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书中指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必须在承认矛盾普遍性的前提下，着重研究其特殊性；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社会主义社会为消除社会发展的自发性提供了根本的前提，但是要真正做到消除这种自发性，实现社会的自觉和有计划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严格遵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调整 and 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赖以发展的重要动力，而经济体制以及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的改革，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基本规律；改革的实质，归根到底是要根据一定的生产力状况，采取最适当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来最大限度地、全面地发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内在的动力作用，推动生产和需要的矛盾运动，发展生产力；等等。

韩树英不仅在理论上坚持理论与实践、哲学与社会主义的统一，而且将其彻底贯彻到自己的工作实践中。他善于从哲学的高度和把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勇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做到了党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不仅是用哲学引领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倡导者，更是推动者和实践者，体现了作为一名彻底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本色。他毕生致力于党的理论教育事业和思想理论建设事业，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致力于用哲学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体现了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忠诚党的理论教育事业以及国家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的崇高风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哲学研究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统一的优良学风，以及勇于坚持真理、勇于实事求是、勇于开拓创新的可贵品质。韩树英的精神风范和高贵品质同他的哲学理论贡献一起，共同构成了他为党的理论教育事业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所增添的宝贵精神财富。



读〔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

□ 徐春辉

费正清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曾在中国研读、旅行和工作，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伟大的中国革命》是他考察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一项成果，有评价称其为“讲述中国革命的最佳著作”。在书中，他以独特视角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不可小觑的力量”，称赞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理想的、无私的、为改善人民大众生活而努力的组织”。

“极热诚地忠于他们的事业”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第一次来中国时，费正清就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了解。20世纪40年代，他又先后两次来到中国，结识了很多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认识了龚澎、乔冠华，与周恩来也有进一步的交流。随着对中国革命研究的深入，费正清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极热诚地忠于他们的事业”，努力创造一个不同于国民党的新秩序，因此，他也预言：中国共产党必定改变中国的命运。

费正清提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充当开路先锋，他们把革命精神传播到各行各业的底层，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战斗的工会、农会。在书中，他这样描述：“商人更加积极爱国，他们抵制外国货物，捐献财物。新成立的工会，特别是在外国人的工厂中，

在罢工、游行示威中起着骨干作用。甚至农民也积极响应……”在中国共产党人唤起工人、农民奋起抗争的努力下，“千千万万青年变成有新的精力和为意识形态理想献身的积极分子”。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开荒种粮，用尽各种办法大力发展生产。每一位到过延安的旅行者，都能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纪律性和忠诚度。费正清称赞延安正如斯诺和其他美国记者向世界报道的那样，是一个“人人想去的、充满阳光的、愉快和蔼”的地方。他指出，那里的革命士气和热情“非常令人感动”，外交官员和一些曾经到过现场的指挥官，对于共产党运动的决心和力量都是“很称赞的”。在提到延安成功的秘诀时，费正清认为除了忠诚守纪律的党员、对人民友好的军队、实行经济上的改良办法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实行了一种有说服力的民主办法，即“三三制”。在当时他感叹：“中共的力量完全被低估了。”

“密切考察农民的需求和苦处”

“1928年中国的希望似乎就在国民党一边，中共一直是一个少数派，似乎就要被消灭了。20年后形势为何却颠倒了呢？”在费正清看来，中国

共产党能获得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支持，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关注普通人民的思想、需要和利益，把人民视为“最终的截断者和革命的恩人”，时刻注意“密切考察农民的需求和苦处”。

在对待人民方面，费正清认为国民党“一点都不高明”。他指出，国民党在掌权以后完全改变了性质，“只知道争权夺利，再也不愿意牺牲了”。国民政府根本没有人民参加民主的概念，他们“生活在钞票印刷机旁边”，做官发财变本加厉地盛行起来，一味向人民加税，“想得什么名目，就收什么税”，例如“新兵草鞋税”“新兵养家费”“高射炮手训练税”“驻军取费”等等。费正清因此也得出了“国民政府抵抗日本八年中遭到的灾难是人为的”结论，意识到国民党逐渐失掉了中国人的民心。

相比之下，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和重庆是一个惊人的对比”。共产党其中一条重要的工作原则就是“发现并满足农民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改善农民经济状况，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实行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把更多的希望和机会给予贫苦的农民。不难看出，费正清承认并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巨大努力，他提出，着重动员农民、改变农民生活的情况是“多么切中要害”，这是一种“真正有说服力的”工作方法。为此，他还在书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

法：首先是认真仔细地到人民群众中去发现他们的苦处、不满和需要，然后由党按照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原则，提出解决方案，向人民群众作出说明。在他看来，正是这些让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民心”。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出现在中国。费正清既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起到的重要作用，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的特定情况。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这番事业“一般说来是很成功的”。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费正清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创造天才，“他的思想超过了那些城市出身、企图指导农村革命的共产国际信徒”。他在书中特别提到，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巧妙地应用到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中，对农村不同阶级进行细致而理智的分析，在一定的时期，实事求是地确定和哪些阶级合作，反对哪些阶级，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基础也正是源于这样的具体应用与检验。正如费正清在书中感慨的：“如果中共不是以新的组织技能开始在农村做农民的工作，中共早已被人遗忘了。”他

深刻指出，在具体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

正是由于充分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费正清在书中还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先，是一些关键名词的中国化。比如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常用名词“普罗列塔里亚特”（无产阶级）和“封建”，他认为这两个名词在中国都有了另外一番更契合的解释，实现了中国化。其次，中国革命理论也必然有自己的本土气息，费正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方面是基于一种不同于苏联革命在农村性质，另一方面是基于文化和历史自尊的积极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自主理论创新。因此，他也指出，“中国人民只能接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理想、有科学理论指导、努力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通过客观地分析中国革命形势，他最终得出：“1949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

